

6.

着



内 容 提 要

抗战时期的桂林，是“抗战文艺运动的大据点”（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51页），在当时即获得了抗日救亡“文化城”之声誉。建国以来，现代文艺研究领域对这一重要内容极少论及，系统地论述其文艺运动的专著更无。本书在介绍战时桂林文艺概貌的基础上，对桂林文艺运动的各个发展阶段作出具体细致的勾勒；对文学、戏剧、美术、音乐、舞蹈各文艺门类的活动概况，分别列专章进行评述，论及了茅盾、巴金、夏衍、艾芜、艾青、田汉、胡风、柳亚子、邵荃麟、欧阳予倩、熊佛西、于伶、杜宣、徐悲鸿、李桦、黄新波、张曙、吴晓邦等一百多位文艺家在抗战时期的活动及作品，是国内第一本全面反映战时桂林文艺运动，为中国现代文艺史和抗战文艺史填补重要内容的文艺史性质的研究专著。

本书对从事抗战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中国现代文化史、中共党史以及广西地方史研究的专家、科研人员及有关单位和大专院校文科教师、学生，均有参考价值。

桂林抗战文艺的成就和意义

——李建平著《桂林抗战文艺概观》序言

林 焕 平

李建平同志是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年轻理论工作者，他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对桂林抗战文艺尤感兴趣。他没有亲身经历过桂林抗战文艺的活动，却从无数文献资料中抽出其中的主要情况，进行系统整理与概括，写成《桂林抗战文艺概观》，是一部难得的书。桂林抗战文艺是中国整个抗战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这本书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桂林抗战文艺概观》有以下特点：

一、材料翔实、系统、全面，又比较丰富。

这部书论述的事情和人物、时间、地点、过程，都调查清楚。论述的逻辑系统，从概述，文化城成因，到文艺各个领域，如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的分论及人物和作品的重要分析，都一目了然。在概括中必要的问题都讲到了，文字比较简约而内容丰满。

二、论述了文化城发展的分期和形成原因。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发展分三个时期：

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一年三月，为第一个时期——第一次高涨时期。

从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一九四二年三月为第二个时期——低落时期。

从一九四二年三月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为第三个时期——第二次高涨时期。

桂林文化城的形成与高——低——高的发展，与抗战形势及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与党的统战政策的成功，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总的抗战形势的发展，例如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许多文化人涌到桂林。原来在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也被迫迁到桂林。这使桂林文化城自然地又是必然地形成起来。

文化人为什么涌到桂林来而不到别的地方去？这又是国内的政治形势使然。

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下称李、白、黄）的矛盾向来很深。与老桂系李济深的关系尤为恶劣。而迫于抗战形势，蒋介石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与李、白、黄妥协。并且不得不委派李济深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本人思想向来比较开明，又出于对蒋的怀恨，李、白、黄也出于罗致贤士，巩固自己地盘的需要；于是，他们都对外来的文化人，采取欢迎的态度。原来在上海、武汉、广州、香港的文化人，觉得桂林有比较民主的空气，宜于开展文化工作，于是就涌到桂林来了。

党抓住这种微妙的政治关系，积极主动地在广西开展统

一战线工作，争取与李济深及李、白、黄团结合作，积极抗线，反对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党团结了李济深及李、白、黄，也团结了广大文化人，使他们在桂林有安身之地。这样，桂林文化城也就形成和发展起来。

而一九四一年的低潮时期又是为什么呢？这是皖南事变的直接恶果。国民党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突然袭击，发动了使世界震惊的皖南事变，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了大后方，桂林也不例外。《救亡日报》被封闭，大批文化人逃亡香港。文化城于是出现了低潮。

为什么一九四二年三月以后又逐渐高涨起来呢？

基本原因在于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大批文化人不能不撤回到内地。到重庆，那是法西斯魔窟；到昆明，那里的空气并不那么好。延安又被封锁，于是相比之下，还是桂林稍为安全和稳定。而在李、白、黄来说，皖南事变以后，大批文化人逃离广西，实质上是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和力量。所以香港沦陷以后，大批文化人回到内地，他们都采取比较欢迎的态度。于是，文化人又在桂林安顿下来，文化城又逐渐走向高潮。

三、对人物和作品作重点介绍和分析。

文学方面重点介绍了茅盾、巴金、艾芜、王鲁彦、艾青等人。戏剧方面重点介绍夏衍、田汉等人。文艺评论方面重点介绍茅盾、郭荃麟、林焕平。美术方面重点介绍徐悲鸿。音乐、舞蹈方面重点介绍张曙、吴晓邦。

茅盾在桂林只住了九个多月，但他的成就和影响却极大。

茅盾在桂林写了他的长篇代表作之一——《霜叶红似二

月花》和长篇记叙散文《劫后拾遗》等。此外，还有他在文学评论方面的成就。

茅盾是我国自五四以来的一位伟大批评家，他一生从事创作仅二十年——一九二八至一九四八年；而他从一九一六年走向人生、走进文坛，到一九八一年他逝世止，毕其一生，都从事评论工作。他一生所写的文学评论其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艺术性，从艺术性与思想性来评论文学作品，因此现当代的作家都深受他的教益。他的成就大致分为两个方面：

（一）为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对当时的文化堕落和社会黑暗，痛下针砭。

（二）为文学评论，几乎集中全部笔墨，讨论文学形式和技巧问题。

抗战时期巴金在桂林呆过几年，他的文学成就也是卓越的。他的著名长篇《火》也是在桂林写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从上海迁来桂林，出版了许多好书，不仅有创作，而且也介绍了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这对于桂林的抗战文学，起到了极好的滋养作用。

另外艾芜、王鲁彦在桂林的文学成就，也很值得注目。

艾芜抗战时期的创作有十六部，在桂林写的占多数。如他的乡土小说《故乡》，就是在桂林完成的。可以说，艾芜在桂林时期的创作，使得他在文坛上永远占据了一席之地。

王鲁彦从悲惨的逃亡中来到桂林，又在敌人兵临城下的炮火中寂寞地死去。他是不幸的，他主编的《文艺杂志》，却是很有影响的刊物。

这里还特别提一提艾青。

艾青是我国现代著名诗人，也是七月派最重要的代表。

他是从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很深的诗人走向革命现实主义而获得杰出成就的诗人。有人说作《画梦录》的何其芳是诗人，以后的何其芳就不是诗人了。如果同样拿这条“原则”去评价艾青，说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艾青是诗人，以后的艾青就不是诗人了。那么我的意见则相反。写《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艾青是诗人，写《向太阳》、《北方》、《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的艾青，更是杰出的诗人。《向太阳》显出艾青的思想转变。《吹号者》是诗人自身的体现，是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体现。而《他死在第二次》，则是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崇高反映。

《大堰河——我的保姆》，使艾青在诗坛上崭露头角，而《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才使艾青在诗坛上竖起了杰出的丰碑。

还应当指出，艾青在桂林所写的《诗论》，是用语录体写的，或者说，是用散文诗的形式写的。全文二百五十多条，除极少数条目仍有初期个人主义的忧郁、感伤情调外，其余都体现出一位爱国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诗人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所体验出来的健康思想和优秀诗歌理论，对今天的广大诗人仍有很深刻的启迪作用和参考价值。

艾青同何其芳一样，如果不是走上后来所走的这条阳光灿烂的康庄大道，仍然停留在《大堰河——我的保姆》和《画梦录》上面，恐怕人们已把他们的名字淡忘了。

本书独辟蹊径，专章讨论文艺评论，足见作者对文艺评论的重视，而且重点介绍茅盾、邵荃麟、林焕平评论活动。

邵荃麟以其正确的文艺观点，影响着当时的文艺界。他主编的《文化杂志》，是当时桂林无数杂志中学术水平很高的

一种。在这个杂志的周围，团结了大批文化人。他不只是以文艺评论影响文坛。而且他还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担负着领导文化城的文化工作的重任。他谦虚谨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和扩大文化界团结，推动文化工作的发展。特别使人感动的是，日寇进攻桂林，他负责组织文化人撤退。兵临城下，王鲁彦同志不幸逝世，他负责料理完王鲁彦的后事，文化人也都撤走了，最后他才拖着疲劳不堪的病弱身体，含着悲愤的热泪离开桂林。当时桂林文化人无不为之感动。

我的文艺评论工作，谈不上什么贡献，只是有一个特点，比较重视对文艺界的得失并及时进行总结，如《岁末话文坛》、《五年来的文艺界》、《当前文艺界的中心问题》等。从得失的回顾中，指出文艺界前进的道路。

我在桂林所写的《文艺的欣赏》，当时是鉴于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在青年中间影响很大，才意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观点，对他的某些偏颇加以评论。由于是尝试美学观点的通俗化，内容不够深厚；对主客体的统一，也阐述得不够。

在美术和舞蹈方面，作者重点介绍了徐悲鸿和吴晓邦。

徐悲鸿是我国现代美术的一代大师，在国内外有极深远的影响。抗战爆发后的一九三八年，他就来到桂林，抗战激发他强烈的爱国激情。在桂林他创作了闻名国内外的《漓江春雨》，把漓江的美描绘到了极致。而且，“春雨”还含有深刻的内蕴，即祖国的河山是有希望的。

特别有名的是《鸡鸣不已》，它描绘一只矫健的雄鸡，站在一块巨石上，仰天狂叫。画题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日寇侵华，半壁河山，沦入敌手。但人民正在觉醒，正在奋起抗战。虽然“风雨如晦”，漫天灰暗。但已“鸡鸣不已”，离天亮已不远了。

徐悲鸿以画马名闻天下。无论谁，得到他画的一幅马，即视为珍宝。他所画的，都是骏马，飞马，跃马，使人看了，整个身心都跃跃欲飞。充分体现出一时代精神和风貌，也表现出一位天才艺术家的伟大的爱国胸怀！

吴晓邦是我国现代舞蹈的创立者和建设者，成就卓著，有目共睹。

抗战爆发，他参加救亡演剧队。后来到广西，他参加陶行知所组织的新安旅行团，该团成员大多数为十五、六岁的儿童，所以又叫儿童团，为抗战宣传而效力。

他把舞蹈作为中华民族新生而效力的手段。

他把舞蹈艺术与中国革命密切结合起来。

这是一条健康的、正确的艺术道路。

他所创作的舞蹈《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舞》、《流亡三部曲》、《春的消息》、《虎谷》等等，都是抗战舞蹈的杰出作品。

这本书对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的业绩，虽有论述，但仍感不够。夏衍在桂林办《救亡日报》，在抗战宣传和文化艺术上的影响深远；他创办《野草》杂志，倡导抗战杂文以及他本人所写的文艺性政论性杂文的成就；他的剧本创作的收获和他在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都应当有较详尽的介绍。

田汉在桂林文化城的活动，成绩卓著，他的剧本创作，他担任新中国剧社社长的活动（新中国剧社社员有时几乎连

饭都没得吃，都是田汉为他们张罗一口饭吃），特别是西南剧展的组织领导工作与他在桂系上层所施展的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都值得大书特书。

欧阳予倩在桂剧、彩调的改革工作和西南剧展的组织领导工作，都卓有贡献。

阳翰笙的历史剧《天国春秋》，描写杨秀清与韦昌辉的内部分裂与斗争，导致太平天国的灭亡。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进行了一、二、三次的反共高潮。团结抗日则存，分裂投降则亡。在这样的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天国春秋》在桂林演出，轰动了全国。这些，都应该指出来。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于桂林独秀峰下

目 录

桂林抗战文艺的成就和意义

——李建平著《桂林抗战文艺概观》序言

.....林煥平(1)

第一章 概况.....(1)

一 战时的桂林.....(1)

二 来桂文艺家行踪.....(4)

三 文协桂林分会的成立及活动.....(13)

四 文艺运动发展的几个阶段.....(17)

第二章 文学创作活动(上).....(30)

一 巴金、王鲁彦等人的抗战小说.....(31)

二 司马文森、邵荃麟等人的暴露小说.....(36)

三 茅盾、艾芜的社会剖析小说.....(41)

四 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的乡土小说.....(50)

第三章 文学创作活动(下).....(59)

一 艾青、彭燕郊等“七月派”诗人的诗作.....(59)

二 黄宁婴、陈残云等人的诗作.....(65)

三 夏衍、聂绀弩、秦似等人的杂文.....(71)

四 报告文学与散文	(79)
第四章 文艺评论活动	(90)
一 进步文艺界的理论批评工作	(91)
二 茅盾、邵荃麟、林焕平的文学批评	(96)
第五章 戏剧活动	(104)
一 蓬勃开展的戏剧运动	(104)
二 欧阳予倩、夏衍、田汉等人的剧作	(117)
三 西南戏剧展览会盛况及意义	(123)
第六章 美术活动	(133)
一 进步美术界的抗日美术运动	(133)
二 美术展览会盛况及影响	(138)
三 徐悲鸿、李桦、黄新波等人的创作	(142)
第七章 音乐活动	(151)
一 群众性救亡音乐活动的开展	(151)
二 重要的音乐会和音乐活动	(157)
三 张曙、林路、陆华柏等人的创作	(161)
第八章 舞蹈活动	(167)
一 吴晓邦与新舞蹈运动	(167)
二 舞剧《虎爷》及其意义	(169)
三 《军民进行曲》等歌舞剧及戴爱莲的舞蹈活动	(171)
后 记	(176)

第一章 概 况

一、战时的桂林

1938年10月，以武汉、广州失守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桂林的抗日文艺运动，也正是由此时开始，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兴盛的局面，从而在大后方，获得了抗日救亡“文化城”的声誉。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实行片面抗战政策，致使华北、华东、华中国土大片沦陷。人民流离失所，举家南迁。武汉、广州失守后，加之长沙大火，一时间逃难的民众蜂拥般撤到桂林，桂林的人口急剧膨胀。1936年，国民党广西地方当局将省会由南宁迁至桂林时，桂林人口为7万，1938年底，桂林人口已增至近12万，1942年，达31万，1944年桂林大疏散时，人口超过50万（以上人口数字依次见于：庄智焕：《桂林市政之检讨》，《建设研究》1939年1卷2期；《桂市公布十年人口统计》，《建设研究》1942年5卷1期；《桂林市年鉴》特3页，1949年版）。许多机关、学校、研究机构、报刊社、学术团体以及工厂也纷纷迁来桂林，仅在1938年底至1939年春的短短几个月里，迁桂的单位就有：中

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地理研究所、中国航空公司、中华职业教育社、生活教育社、汉民中学、无锡国学专修馆、江苏教育学院、《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国民公论》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等。由于人口骤增，桂林市区也空前扩大，西面市区由翊武路、榕湖一带扩展到甲山，南面市区扩展到将军桥以南，北面市区延伸至连接灵川县境。漓江东岸的东江市区变化更为明显，建干路、三里店、施家园、六合路等新居民点，成为外地迁桂人员的主要居住地。据统计，1944年桂林沦陷前夕，全市共有房屋52,557间（《桂林沦陷杂记》，1949年《桂林市年鉴》），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市区。

战时桂林的各项事业也有了很大变化。工业方面，抗战前桂林较有规模的工厂只是电力厂、修械厂、广宜安机米厂、民生木机纺织厂四家，其他是规模小、技术落后的手工业工场或作坊。抗战后，由于许多工厂内迁，桂林的工业获得较大发展。1943年12月时，桂林较有规模的工厂已达207家，超过当年柳州、南宁、梧州三市工厂的总和（广西省政府统计室编《三十二年度广西统计年报》）。交通的发展也很快。公路方面原有连接广东、湖南及桂南的桂八路、桂黄路、桂柳路，抗战后又增修了连接贵州的桂穗路，于1941年7月通车。1938年9月通车的湘桂铁路，成为大后方连接粤汉、浙赣线的大动脉，是整个大西南的重要铁路干线。1938、1939年，桂林又开辟了临桂、央塘两机场，有民航班机通重庆、香港。桂林一时成为大西南的交通枢纽。战时的商业和金融也日趋繁荣。战前全省仅有广西银行一家。1944年，全市已有分属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及私营的商业银行共20余

家，广西地方当局的银行也增为广西银行、广西农民银行、桂林市银行三家。商业方面，1940年，全市共有商店2593家。桂林市场一时甚为繁荣。

文教、新闻出版事业是桂林市各项事业中发展最快的。当时，桂林共有大专院校9所：国立广西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省立医学院、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江苏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修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西南商业专科学校、榕门美术专科学校；有公、私立中学10余所，小学上百间。科研单位有李四光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丁西林主持的物理研究所、汪敬熙主持的地理研究所。新闻、出版方面，抗战前，全广西只有报纸11种、杂志9种（许晚成：《1936年全国期刊统计》，《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中华书局1955年版）。抗战期间，桂林共出报纸10种：《广西日报》、《救亡日报》、《力报》、《扫荡报》、《大公报》（桂林版）、《大公晚报》、《自由晚报》、《广西晚报》、《小春秋》、《民众报》，另有国际新闻社、中央通讯社、《新华日报》桂林分馆、桂林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先后出版各种杂志140余种。书店、出版社林立，显示了出版业的兴盛。1938年《克敌周刊》23期丽妮《战期中桂林文化的动态》一文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桂林的街头，最容易触目的，是贩卖精神食粮的书报店的增加率，和贩卖粮食的饭菜馆，等量齐观。试看桂林的文化街范围，已从中北中南两路，拓展到桂西环湖二路。战前桂林原有的新书□□，仅有桂海、文海、文源、文南、大成、典雅、前导七家；报局莫林记、

张日光两家，旧书店全文堂、经益、少卿、石渠……等几家。战后，生路、正中、开明、生活、中华、文明、商务各家，都先后来桂设店。

这里所谈的，仅是1938年时的情景，而整个抗战期间，桂林先后有书店、出版社140多家。当时，每天出版书刊在20种以上，刊物销路约1万份，远销大后方各地及香港、南洋一带。桂林成为大后方文化事业的重要据点。著名出版家赵家璧谈战时出版界状况时说：抗战时期的书刊，有80%是桂林出版的（《忆桂林——战时的“出版城”》，1947年5月18日上海《大公报》）。就这个意义来说，说战时桂林的文化事业支撑着大后方的文化，是一点不为过的。

由于特殊的原因，战时桂林在飞速地发展变化着。当时任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说，桂林是当时“江南唯一繁盛都市”。（《李主任谈桂市应即疏散》，1941年4月14日桂林《大公报》）这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局面，给桂林文艺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

二、来桂文艺家行踪

抗战爆发后，由于北平、上海等中国的文化中心的陷落，战时中国的作家被迫进行了大迁移。许多作家在战火中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其间流徙辗转之苦是难以言状的。茅盾、艾青可视为流徙最苦的代表。

茅盾 抗战爆发时在上海，上海沦陷前夕转到广州、香

港，后去武汉，数月又折回香港，1938年底赴新疆，1940年5月到延安，10月到重庆，皖南事变后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3月撤到桂林，住至同年12月后去重庆。国外研究者称茅盾这一时期为“流浪期”（松井博光：《黎明的文学——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高鹏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艾 青 抗战开始后由上海至武汉，1938年初由武汉到山西临汾，数月后转西安又折回武汉。1938年11月到桂林，居住至1939年9月赴湖南新宁，1940年春赴重庆，后去延安。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艺家大多具有这种流动性质，来桂文艺家的流动性相当大，因而有必要对其来桂前后的行踪，作一简单勾勒。

郭沫若 1938年12月3日由湖南南岳到桂林，同月27日赴重庆。在桂24天。

茅 盾 见前述。

巴 金 来桂三次。第一次：1938年11月广州失陷后撤来桂林，1939年2月离桂赴上海；第二次：1941年9月由昆明到桂林，1942年3月离桂；第三次：1942年10月到桂林，1944年5月离桂赴贵阳。在桂约两年5个月。

叶圣陶 1942年5月2日离开成都，同年6月4日到桂林；7月10日离桂返川。在桂1月。

柳亚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开香港，1942年6月到达桂林，1944年9月离桂赴重庆。在桂两年3个月。

胡 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开香港，1942年3月到桂林；1943年3月离桂赴重庆。在桂1年。

胡愈之 1938年冬到桂林，1940年夏离桂。在桂一年半。